

# 庄严与谐谑的旅程

——1905 年中美互访及其旅行记述中的中美形象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 1905 年,中美双方互派使团访问,双方都留下了旅行记述,透过这些记述,可以窥见双方相遇前后彼此之间的情感态度、价值评判、文化误解与现实回应。由于主客双方的原因,中美之旅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色彩:美国代表团轻松愉快颇具喜剧色彩的旅程与中国代表团庄严、凝重的旅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彼此之间礼物馈赠的不对等以及不同的价值赋予,情感态度上的“亲善”与“轻蔑”相互之间东方化与西方化的想象性再现与阐释,折射出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悬殊和政治体制、社会现实、礼仪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国际交往中的体现。

**关键词:** 中美互访;礼物外交;中国形象;美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6)01-0064-07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6.01.009

1905 年盛夏,时为美国战争部长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率 80 余人的代表团,正式对日本、菲律宾、中国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访问。其目的是与日本在朝鲜和菲律宾问题上达成协议,平息因美国排华法案在中国本土引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促进美国在华贸易,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势力。对于美国而言,这次出访关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商业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关乎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人赴美旅行的权利和在美华人的生死存亡,同时,也关乎当时中国民间抵制美国的抗议者们的命运。无疑,对于中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次赋有重大政治使命的庄严的旅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次旅行却被涂上了某种

喜剧色彩,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官方政治出使的严肃性和崇高性,而颇具反讽意味,反映了美国官方与个体的对华态度以及相遇时的行为。当然,这是一出由访问者和被访问者合演的戏剧,因此,双方相遇前后的互相误解与现实回应,折射出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悬殊与政治体制、社会现实、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1905 年 7 月 8 日,美国代表团乘坐“满洲里号”自旧金山启航。代表团中 50 人为官方代表,包括外交官、上议院和众议院议员,非官方代表 30 人,包括部分议员的家眷、旅行家、个体艺术家以及调研中国铁路投资收益的成员等。代表团中有一位备受关注的成员,是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她应慈禧太后之邀访问中国。罗斯福小姐一直以特立独行而备受美国公众关注。1905

收稿日期: 2015-11-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民国时期旅美游记文献整理与研究”(13YJA75100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晓兰(1963-),女,甘肃张掖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城市文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年7月4日那天,为欢迎从美国各州汇聚到旧金山的出使代表,在火车站台上燃放礼花,她用左轮手枪射击点燃烟花。美国第一小姐的随行为此次出使增添了浓郁的喜剧色彩,也使美国媒体和公众异常兴奋。美国报纸称“美国第一小姐的东方旅行”为“爱丽丝漫游奇境”。[1](P.71) 她的中国之行被称为“一次随意而自然的访问”。[2](P.94) 罗斯福小姐在回忆录《忙碌的时光》中对于此次旅行做了如下描述“塔夫脱一家很愿意我与他们一起去,很难想象对于我那个年龄的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礼物。父亲是总统,我除了自得其乐外别无他事。”[1](P.69) 其回忆录以及代表团随行人员弗洛斯特日记描绘了代表团一行轻松谐谑的海上航行和充满神秘、危险、怪诞意味的东方之旅:航海途中的模拟法庭、讲座、床单枕头晚会、化妆舞会、桥牌、小小的赌博、摆姿势照相等。她在中国的行踪与塔夫脱对于中国抵制美货问题的解决进展成为当年美国媒体有关美国使团访问中国新闻报道的两大焦点。翻阅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关于塔夫脱1905年的亚洲之行主要记录了他在菲律宾和日本的活动,尤其是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签署秘密备忘录,是美国外交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事件,但关于他的中国之行则一笔带过或付之阙如。塔夫脱一行也并未赴京面见慈禧太后。美国代表团在香港被告知广州危险,于是兵分两路,塔夫脱一行到抵制美货激烈的广州,他先前担心代表团成员会受到侮辱,但他们自己却未正装出席广州总督在八旗会馆举行的宴请。塔夫脱一行自广州到抵制美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便途径首尔径自回国了。罗斯福小姐一行则乘坐美国军用运输舰“洛根号”自香港经广州、山东、旅顺、塘沽,抵达北京。与她同行的有接替美国使馆卫队的海军陆战队150名队员以及海军少将、美国公使、议员及其夫人们。清廷视罗斯福小姐为美国总统的重要使者,所到之处无不受殷勤隆重的款待。慈禧派自己的专列在塘沽迎候,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参与接待并亲自担任翻译。罗斯福小姐应慈禧太后之邀在颐和园留宿,后应袁世凯之邀赴天津,在月台上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仪式上,新军仪仗队和军乐队演奏了美国国歌。

1905年深秋,清廷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率团出使欧美考察政制。时任户部右侍郎的戴鸿慈和端方(由湖南总督调任闽浙总督)率团赴

美、德、奥、匈、俄罗斯、意大利考察政制。朝廷及出使大臣们视此次出使为极其严肃、庄严之国家大事。自出使前的准备、海上的旅程以及出使记述的写作风格,都体现了此次出使的凝重与庄严。戴鸿慈在其出使日记中表达了他对于此次出访的态度“自惟文学进身,未谙外务,闻命之下,弥切悚惶……感惧交集,夜不成寐。”[3](P.311) 出访前,戴鸿慈会通四大臣,确定随员名单,上奏朝廷,蒙慈禧召见,会奏随员事宜,拜访、公宴各国驻京公使,准备国书。出发当天,晨起拜祖,亲友相送。在正阳门火车站上发生的爆炸为此次出访增添了悲剧色彩。有人在出使大臣的车厢引燃炸弹,两大臣多处受伤,1人双耳震聋,1人垂危。其他人3死10伤。代表团只好打道回府,原定出使中有要差和事故不能随往者9人,只好改调他人,择日而行。代表团终于阴历11月11日再度启程,依然晨起拜祖,送行者踵至,火车站警察稽查严密。代表团团员有钦差大臣2人及文武官员36人,有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及商部、户部、兵部、刑部官员,直隶候补道、湖南、江西等地随同考察官员,此外,差役7名,留学生11人。使团于阴历11月23日乘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西比亚”号邮船由沪起航,经长崎、神户、横滨,于12月18日抵旧金山,海关例行病疫检验。美国当局安排某大学“财政教习”接待,派密探侦探数人随从保护,“盛意可感”[3](P.339),但无宴请。第二日,美国“水师提督”(Goodrich)、“陆军提督”(Summerall, Funston)等来见,中国代表团邀请美国东道主即财政教习、海军上将、陆军元帅等人午膳。了解一下美方派到旧金山接见中国使团的三位海、陆军将领的身份对于理解此次中国使团的美国之行不无助益。古德瑞奇(Caspar Frederick Goodrich, 1847-1925)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1900-1903年间为费城及朴茨茅斯海军指挥,1904年晋升为海军上将,为太平洋海军基地总指挥。萨莫尔(Charles Pelot Summerall, 1867-1955)于1899-1900年参加镇压菲律宾暴乱,1900-1901年庚子事变期间参加了攻打北京的军事行动,1901年荣升为海军上校,1905年时为西点军校炮兵战术资深指导。冯斯顿(Frederick N. Funston, 1865-1917)1905年时为美国陆军元帅,在美西战争、美国与菲律宾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在菲律宾战争中的

杰出表现而获得荣誉勋章,极力鼓吹美国扩张主义。美国当局派这些军界代表及大学财政教师接待中国使团,武力的夸示和威胁与商业利益的考量不言而喻。

中国代表团在这位财政教习的陪同下,乘火车自西至东穿越美国,于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抵华盛顿,率随员谒见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敬致颂辞:“美大总统与大清国皇帝‘重友国之邦交,复能持太平之全局,至为荣幸。谨颂大伯理玺天德福寿康强,并大美国人民太平幸福’。”[3](P.349) 罗斯福以茶酒款待,并赠中国代表团他自己的著作一部。中国使团赠美国总统《北洋秋操图》一幅,送给总统夫人白玉杯壶一件、苹果青瓶一件,其余副总统夫人、外部大臣夫人等都赠送了礼物,以为“美俗尊女,从其国风焉。”[3](P.355) 此次出访,戴鸿慈一行领款26万两白银,在上海购买各国汇金用去17万两。[3](P.317) 虽然时事维艰,但考虑到国外京城旅馆昂贵,“过俭则无以尊国体,权衡丰啬,极费踌躇。”[3](P.332) 此时,罗斯福小姐东方之行的礼物关税问题在美国公众间所引发的热议刚刚落下帷幕。

就在9月罗斯福小姐访问北京期间,慈禧给她和20多个代表团成员及其夫人们赠送了贵重的礼物。爱丽丝得到的是两个戒指、一对耳环、翡翠玉镯、一些白玉、狐皮、貂皮大衣、成箱的锦缎,后又派专人送去用镀金镶框装裱的慈禧自己的照片,外加一只京巴狗,爱丽丝为其取名为“满清”,养在白宫。爱丽丝应袁世凯之邀赴天津,受到袁世凯和夫人的热情款待,又收到了一批礼物。爱丽丝在回忆录中,除了那只狗和慈禧的照片外,对于她获得的其他礼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她说“东方之旅无疑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旅行。在旅程中得到的礼物捆在一起放在地下室里。”[1](P.108) 罗斯福小姐从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得到的礼物装了27箱。这些昂贵的礼物成为1905年9月-10月间《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罗斯福小姐为礼物支付2万5千美元的关税”称罗斯福小姐“回国后为从东方统治者那里获得的礼物而尴尬,国会讨论减免其关税,但可能性不大……”罗斯福小姐说,她不论到哪里,外国的统治者都送给她很多礼物以示他们对于美国的友谊,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礼物会让她花费这么多钱。而住在白宫的罗斯福家并不富裕,他们为高昂的税款

而烦恼”。[4] 斯达西·罗泽克·考德瑞(Stacy Rozek Cordery)在《西奥多·罗斯福的私人外交官:爱丽丝·罗斯福和她1905年的远东之旅》中写到“爱丽丝作为总统的代表以非官方的身份访问北京,国家首脑赠给爱丽丝豪华、名贵的礼物,是为了巩固两国的关系,而非为了巴结一个美国公民。爱丽丝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并深受公众喜爱的大使,体现了罗斯福外交活动的新方向。”[5](P.25) 罗斯福小姐在回忆录中说,报纸夸大了这些礼物的数量和价值,致使家里不得不为此付税,对此她深感愧疚。罗斯福家最后付税1026美元。[2](P.101) 爱丽丝终身穿着中国赠送的丝绸,戴着古巴赠送的珍珠项链。

中美双方在赠送和礼物处置上的落差又为此次中国之行增添了反讽乃至荒诞的色彩。正如保罗·S·芮恩施所说“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都带有这种成分。”[6](P.11) 以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而言,奢华的宴请、大量昂贵礼品的赠送确有几分非理性的特征,甚至具有献祭的色彩。统治者的慷慨和挥霍是对于其身份、权威、财富的炫耀和夸示,另一方面,也是以礼物馈赠的形式向美方显示中方的诚心善意,以期换取平等相待与免于欺凌的契约。在这个意义上说,中方物质礼物的馈赠并不期待物质上等值礼物的回赠,其诉求与期待远远超出了礼物本身的价值。为表示中方的友好和诚意,美国代表访华期间,清廷向各省督抚下令“从严查究”民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10月以后,抵制美货运动逐渐平息。这才是美方期待的礼物。罗斯福小姐在回忆录中写到她在香港听到有关广州的传闻:“当时的广东正处于激烈的反美情绪中。因此,只允许使团的男人们登陆广州,女士们只允许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看看这个中国大城市狭窄拥挤的街道,偶尔看到对岸一个苦力向我们挥舞着拳头。一幅我坐在四个乌龟抬着的轿子里的漫画在广东流传,据说画此画的人已被处以死刑。”[1](P.92) 事实上,尽管美领馆强烈要求严惩侮辱罗斯福小姐的这些“恶棍”,广州当局下令撕毁所有漫画,但与漫画相关的三人并未被处以死刑,而是被逮捕入狱。倒是一位华侨于1905年7月16日在美国驻沪领事馆前自杀,“以自己的生命激励国人对抵制的决心和信念”,他被誉为

“抵制烈士” [7] (P.62) 上海、广州和内地的城市相继为他举行悼念活动。美国代表团就在这种悲喜混合的氛围中完成了他们的中国之行。

## 二

在罗斯福小姐以及弗兰西斯·W·弗洛斯特旅行记述中,中国民间的抵抗以及生死存亡的悲剧性事件,乃至中国官方的殷勤款待,都以轻松诙谐、冷漠厌恶的笔触加以描述,这种情感基调贯穿在他们的中国旅行经验中,也体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政治图景和自然、人文风景的描绘中。

在北京,罗斯福小姐观看了中国魔术,参观了天坛,看到了马可·波罗笔下“从北京到天坛的同样的道路、同样匆忙的人群、同样的街声、同样的乞丐”。[1] (P.93) 她亲眼见证了传说中的“东方专制”国家,见识了奢华的宫廷和慈禧的权威,但对于慈禧慷慨好客和专横跋扈、喜怒无常背后的政治、文化涵义却无法理解也无心理解。她描绘了皇宫富丽堂皇的建筑、硬得像木头的长方形的枕头、奇怪的宫廷礼仪。慈禧太后设宴招待了她,她非常喜欢中国饭菜,多喝了几杯,有些醉意,一想到自己是美国总统的女儿却在清朝的宫殿里过夜就忍不住大笑。[1] (P.94) 在她眼里,慈禧统治下的满清宫廷和中国怪诞滑稽、不可思议。慈禧高坐在御座上,30岁出头的皇帝坐在御座脚下,“身体萎缩,嘴巴微张,眼睛空洞,面无表情” [1] (P.99) 慈禧甚至没有把美国客人介绍给他。慈禧的专横令人恐怖“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拿下他的头。” [1] (P.100) 突然间,慈禧厉声说了几句话,伍廷芳立刻面色苍白,爬在地上磕头。太后说话,他抬起头翻译,然后又叩在地上。她认为慈禧完全没有在她面前羞辱这位美国大使的理由“看到同样一个人在华盛顿的聚会上坦率发表激烈的言辞,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令人反感的评论,却在一个人的脚下磕头,那是一种奇怪的经验。” [1] (P.101) 她回国后向父亲讲起这一幕时,罗斯福总统的解释是“她向你显示,这个我们平等对待的人,对于她而言不值一提,可以踩在脚下,以此表明我们在她眼里也微不足道。” [1] (P.101) 罗斯福总统本人对中国也无好感,他很少关心中国,对中国没兴趣。他“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他认为,与日本不同,中国人更喜欢古代社会,他甚至怀疑他们能被‘文明化’,能否缔造一个现代国家。他对中国人的缺乏爱国精神而震惊。中国人受

到轻视,不仅因为他们是东方人,也因为他们不可能发展出现代民族精神,他们只满足于过去的荣耀而拒绝进步”。[8] (P.68)

如果说,罗斯福总统及其女儿的中国观代表了美国官方的态度和立场,那么,1905年使团随行人员哈里·福勒·伍兹和弗兰西斯·W·弗洛斯特,作为周游世界的旅行家、艺术家、典型的游客,对于中国的再现则反映了非官方成员对于中国的观感,但基本上未超出当时美国集体想象的意识形态化模式。伍兹拍摄的有关中国的两百多张照片一直尘封于地下室,直到21世纪才公之于世。在马戈·塔夫脱·斯蒂弗等编撰的《看东方——塔夫脱与美国代表团出使亚洲》(Looking East: W. H. Taft and the 1905 U. S. Diplomatic Mission to Asia, 2012) 中筛选的伍兹有关中国的照片,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帝国的眼睛”凝视下的东方化的中国,它们揭示了凝视者心目中的中国,那些被反复捕捉到镜头里的景观是最吸引他们的中国性的具象,也是他们再现中国的关键元素。作为对于中国的视觉阐释,这些照片体现了凝视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念。江面上美国的军舰与中国的帆船和渔船形成鲜明对照,香港气派的大街,欧洲风格的建筑和电灯与中国的纸灯笼、穿白衣的中国式殡葬、轿子、人力车夫古怪地并置。西装革履的西方人夹杂在穿长衫的中国人中间,无处不在的光膀子的成人和儿童,垂在身后的黑黝黝的长辫子在白色的长袍和古铜色的裸体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构成了北京独特的街景。绵延地铺展在街道两边的平房,狭窄的街道上聚集的、分散的人群,人力车、轿子、穿街而过的骆驼、马车,钟鼓楼、天安门、寺庙、牌坊、克林德纪念牌坊、美国使馆等等,这些元素并置在一起形成的对比系统,为中国的风景增添了怪诞的色彩,也展现了凝视者眼中的中国现实。

作为伍兹游伴的弗洛斯特,他寄给父亲的日记不仅提供了如此凝视中国的背景和视角,而且将这种视觉形象转化为了文字,揭示了中国想象与再现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根源,也为我们了解美国官方和民间的中国想象提供了另一维度。这些日记体的书信向远在美国的父亲描绘了代表团轻松愉快的海上航行;在日本受到的隆重的接待;菲律宾政府的殷勤款待,盛大的宴会、阅兵仪式、载歌载舞的游行和颂赞致辞,以及花三个月时间为罗斯福小姐缝制的礼服,摩落族人的军事

演练、土著舞蹈、斗牛等等,东道主夸张过度的殷勤款待与叙述者的冷漠、厌倦形成了鲜明对照。弗洛斯特赞同议员们所达成的共识“当下这一代菲律宾人完全不能适应于独立状态,而未来几代人是否能够独立,将完全取决于正在实行的教育体系。”[2](P.110)美国式的教育将使菲籍工人得到技术培训变成可以信任的合作者。他赞同美国殖民官们对于菲律宾殖民地的观点“由美国来统治菲律宾群岛是有道理的。……美国征服菲律宾的首要目的是出于慈善,而非掠夺,这种壮举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而它必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不朽功勋。”[2](P.111)他以商人的眼光叙述了菲律宾丰富的物产:足以放养上百万头牛的草地,世界上大麻产量最大的地区,丰富的金、银、铜、铁等矿藏。菲律宾要繁荣,就该取消开矿和商业的限制,投入大量美元。自来水厂、电厂是高利润的行业,过去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菲律宾人从河里汲水,天黑就睡觉,不需要晚上阅读,因此不需要电。叙述者的殖民主义立场和观念暴露无遗,他带着19世纪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帝国的眼睛”凝视东方,并在“帝国叙述”的框架中讲述东方。

在弗洛斯特的思想意识中,中国无非是东方国家的一个典型类型。他在日记中描绘了代表团在香港期间的宴会、军事表演和赛马会。欧洲风格的街道和建筑让他惊喜,他在古代雅典、罗马式遗风和高耸气派的石建筑中找到了认同感。但是,香港宽阔的街道和人力运输的强烈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挑夫、苦力和轿夫,反映了中国运输的原始与落后、中国人的价值低下和生存处境的恶劣,但展示这些景象的目的并不在于表达他对于卑贱的中国苦力的人道同情,他对于锡克族警察面对中国苦力的威严和他付给导游的低廉的资费心怀安慰,他在上海街头的锡克族警察脸上看到了一种贵族的高贵,他欣赏被中国人称为红头阿三的锡克族警察的傲慢和威严。在弗洛斯特的笔下,广州是危险之地,中国人不可信赖、变幻莫测。一种巨大的危险即将降临的感觉给这次旅行罩上了神秘色彩,激起了他冒险的冲动。进入他完全陌生因而“杂乱无章”的广州城,“就像迷失在森林里一样”,“狭窄的街道上悬挂着成百上千块招牌,随处可见炫目而俗气的颜色,扯着嗓子喊叫的轿夫,肩挑箱子、行李、垃圾的苦力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开路”。[2](P.125)簇

拥着的人群对他们指指点点,偶尔遇见的绅士则对他们视而不见,很少看到“不屑于负重而行的上层阶层的男人”,更看不到上流社会的妇女,所见最多的是光膀子的男人。狭窄的街道到处是店铺、钱庄,叮叮铛铛数钱的声音和无处躲避的恶臭味,“一天下来,感觉自己染上了日历表上所列出的各种病症”,“所经之事恍若一场可怕的梦魇”。[2](P.126)400万人口挤在3.5万到4万人口的小城那么大的地方,50万船民在船上出生长大,对岸上的事知之甚少。他参观了监狱,但怕染病而没有进去。总之,广州之行是令人厌恶的。从广州到天津缓慢的航行使得这些美国人牢骚满腹、脾气火爆。尽管他们在太后豪华的专列上享受了一顿完美的午餐,但从天津去北京的旅途很是无趣,大片平坦的未开发的土地,大大小小的土丘——“那是祖先的坟墓”。[1](P.140)

在北京的三天,弗洛斯特参观了他所有想去的地方: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鼓楼、天坛、先农坛、黄寺、大钟寺、五塔寺、紫禁城、长城这些经典性的景观。除了紫禁城,所有景点或疏于管理年久失修,或由于八国联军的毁坏或占据而破败不堪。茂密的野草覆盖了天坛和先农坛宏伟壮观的石板大道和赏心悦目的花园,只有皇帝驾临时才修整得干净有序,其他时间,维护费用则被贪污。[2](P.143)弗洛斯特在书信中转述了慈禧接见美国代表团时的奇怪礼仪,像孩子一样幼稚且不受尊重的中国皇帝以及慈禧的金甲套。紫禁城给他的印象只是一个个宫殿和一间间房屋,眼花缭乱的青铜器、景泰蓝、玉器、瓷器、珊瑚、丝绸,它们激起了参观的同伴寻找并拍卖这些器物的冲动。作为国家主权之象征的最高统治者的荒诞行为、腐败的政府、面对入侵者的软弱无能、颓败的国家,是三天的北京之行给弗洛斯特留下的印象,但却定格为整个中国的现实乃至本质。以美国为参照,中国的一切都处在原始、落后的状态。货币不统一、道路不畅、交通落后。人力和驴、马、骆驼是主要的运输和生产工具,火车是皇室享用的特权工具,轮船运输混乱无序,旅馆设备糟糕、肮脏不洁。北京满大街是上身赤裸的男人、小孩、挑担的人群、黄包车夫、独轮车乘客。各种深浅不同的蓝色构成北京的主色调,人群走过,就像穿梭的蓝色斑点。而长城周围的乡村依然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种、收割,依然停留在动物和人力的世界。原始的田园风光、贫瘠的沙地与

巨蟒一样蜿蜒的雄伟长城和令人震惊的辉煌的皇陵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从烟台到上海途中,他碰巧遇见了华商轮船公司的轮船遭水雷袭击的事件,17名中国人被淹死,幸存的中国人“像被斩断了头的小鸡一样尖叫着跑来跑去,嘴里吐着白沫”。[2](P.179)在弗洛斯特叙述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国人,他们的死与生都是丑陋的。对于以周游世界为人生目的弗洛斯特来说,中国之行是不愉快的,何况他得了感冒还起了痲子。他在信中写道“离开中国我很高兴,对于不是专门研究它的人而言,中国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但整个中国之行给了我很多有用的经验,我很高兴我到访过那儿。如果很不幸我得住在中国,那我希望住在上海,上海是我在中国见到的唯一一座新型城市,城市很干净,里面的外国租界很大,如果没有必要,你完全可以不去租借外的中国城。”[2](PP.201-202)但他认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一些声名狼藉的西方男女在故乡待不下去时,最终都来到了东方……上海尤其以江湖骗子出没而闻名”。[2](PP.195-196)弗洛斯特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原始、落后、危险、混乱的国度的鄙视和厌恶之情。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一员,弗洛斯特对于中国的感情和评价以及表述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美国主流观念的演绎。

### 三

与美国的旅行者的中国观感和表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代表团对于美国的亲善态度以及由此影响下出使记述中对于美国的近乎乌托邦化的再现。

戴鸿慈在出使日记中表达了他的寰球意识、国家观念:国家与国土二而为一,政教风俗与国俱立,人种、文明不可磨灭“立于地圆之上,华离剖析,分合错峙,而名之曰国。国不能以虚名寄也,则必有与之并立者矣。政事也、风俗也、言语也、文物也、宗教也、人种也,永永存在不可磨灭,如是者然后谓得之国。是故有国者,务保持而张大之。其犹未也,又从而师其诸邻……凡夫政教、艺术之同异得失,靡不取而细绎之,比较之,斟酌而选别之。萃群族之所长,择己国之所适,文明输入,而不害于国粹之保存。”[3](P.295)他进而批评海通以来赴欧美者专任聘问、事竣即返,对于西方诸国难有深入考察分析。而那些“足未出国门,取其书伏而诵之”者,则歪曲误解、道听

途说,或崇拜或诟骂,与实情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朝廷特派亲贵大臣,“遍历东西诸国考察政治,归以为通变宜民之地”。[3](P.296)也正是抱着如此庄严神圣之目的,使团在航行途中召开会议确立考察宗旨与写作体例“政体由系,宪法是详。体国经野、惟富与强,财用兵制,厥类惟彰”,“若夫游览,风景山川,无关宏旨,概从缺焉。”[3](P.333)在关于美国的考察和再现中,一方面强调勤采访、广搜罗,“勿参成见,畛域胥融”,“造门请益,务得其真”,[3](P.333)另一方面又强调他山攻玉,资我良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关轻重者、有害于邦交和国粹者略而不载的原则。

戴鸿慈的出使日记体现了这一考察原则和写作宗旨,记录了他认为应该参观、考察并值得记载、可以上奏朝廷的美国见闻。在旧金山期间,他们住在12层高的旅店,参观了车船公司、炮台,访问伯克利大学期间参观了机器室、化学院、罗马式剧院。之后乘火车穿山越岭,日行一千八百余里,震惊于汽车火车的速率。一路参观某农务院之植物标本、农具制造室、牛奶场、畜马所,州政府、监狱、疯人院、贫民院、解剖床、痲病院、基督教青年会、芝加哥屠宰场、农器制造厂、百货公司、卡内基钢铁厂、玻璃厂……最后抵达目的地华盛顿,于第二年大年初一乘汽车赴费城、纽约等其他城市,参观国家印刷局、图书馆、水师学堂、军事学院、华盛顿故居、首饰店、银行、交易所、缝纫机厂、保险公司、报馆、铸币局、造船厂、独立厅、尼亚加拉大瀑布、水利发电公司、美术馆、独立堂、哈佛、耶鲁等,这些代表着美国政治制度、经济成就、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教文化成就和精粹的经典景观。日记对于这些景观进行了貌似“现实主义”、“科学主义”的“客观”描述,其中充斥着各种有关历史事件、人口数量、生产规模、建筑物大小等等的数据和生产程序的冗长的描绘。除却参观访问和日记记载的双重选择中的主观性因素外,即使作者尽量规避个人的主观情感,但仍然免不了对其耳闻目睹的现实景观进行主观评价,而这些评价往往倾向于正面乃至理想化,并且以点带面,将局部上升为整体。譬如,参观内布拉斯加监狱,饮食丰盛、牢房洁净,“监牢非以苦痛犯人也,束缚其自由而仍使之作工,故西人有改过所之称”。[3](P.344)参观耶稣教徒所设青年会,7000个孩子的心性教育、智能培训之完备使“儿童不患无谋食之地矣”。[3](P.346)老兵

院风景优美,树木萧疏,弥望空阔,吐纳清气,“盖国家欲军人之出力报国,诚不可无此以激励之。田子方谓‘少用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3](P.352)观华盛顿故居,“室中陈设朴素,无异平民。以有白宫之造型,历代总统咸责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而油画之昂贵,“足见美人之奢侈”。[3](P.353)某报馆发行量之巨,可知“人民智识之程度,恒与报馆之销数为比例”。[3](P.358)震惊于芝加哥屠宰场的巨大规模和先进设备,详细描述了屠宰程序,“商家私立者,政府惟令检察其畜肉之有毒与否,其他不干涉也。故其势力盛大,其组织亦绝周密,如电话、电报、运送之汽车”等等无不齐备。[3](P.347)而就在代表团访问美国当年,厄普顿·辛克莱以此为背景的小说《屠场》在杂志连载,揭露了屠场黑暗的非人世界。

观察者抱着亲善的态度和择其精粹而学习的态度,带着羡慕赞赏的眼光凝视美国、解释美国、再现美国,其记述塑造了一个国土广袤美丽、军事强大、经济发达、技术先进、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合理的国家形象,其中无不透露出对于他所理想化的美国民主制度、现代文明、价值观念、社会组织形式、军事策略等方面的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之旅,对于游记者个人而言具有价值和认知转型的作用。1911年之后,这种价值认同逐渐被普遍化,影响着中国人对于美国

乃至西方的凝视、阐释和再现,进而影响了对于中国本土的自我言说和民族自省。

#### 参考文献:

- [1] Alice Lee Roosevelt Longworth. *Crowded Hours, Reminiscences of 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 [M].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33.
- [2] 马戈·塔夫脱·斯蒂弗,沈弘,詹姆斯·塔夫脱·斯蒂弗. 看东方——1905年美国代表团访华之行揭秘 [C].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3] 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 [M] //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第9卷.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4] Miss Roosevelt to Pay \$25 000 Duty on Gifts: Presents from Oriental Rulers Embarrassing on Her Return [N]. *New York Times*, 1905-10-17.
- [5] Stacy Rozek Cordery. Theodore Roosevelt's Private Diplomat: Alice Roosevelt and Her 1905 Far Eastern Junket [M] // Natalie Naylor, Douglas Brinkley, John Allen Gable. *Theodore Roosevelt: Many-Sided American*. Interlaken: Heart of the Lakes Publishing, 1992.
- [6] 保罗·S·芮恩施. 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M]. 李抱宏, 盛震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7] 黄贤强.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中国城市抗争的研究 [M]. 高俊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8]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1.

## Solemn and Ironic Journey——Images of China and America Narrated by Visits and Travel Writings in 1905

CHEN Xiao-l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exchange of diplomatic 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1905 gave birth to several travel writings, which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catch a glimpse of two nation's emotional attitude, value judgment,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and realistic response. Due to the complicated motives, two visits are colored quite differently, reflecting on the striking contrast between American comic banter and Chinese imposing solemnity, the non-reciprocity in the gifts presenting, the emotional "hospitality" and "disparagement", the orientalizing of China and occidentalizing of America in mutual imagin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ll these displayed in the world the gap in term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reality and public etiquett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Key words: The exchange of diplomatic miss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gift diplomacy; image of China; image of America

(责任编辑: 吴芳)